

黑孩是汪曾祺先生喜欢和关爱的一位年轻女作家。

黑孩是值得汪老喜欢和关爱的。黑孩文学创作的起点较高,出手不凡。1987年,她的处女作短篇小说《醉寨》即在《作家》发表,并得到了文学评论家程德培的激赏。不久,在《萌芽》《钟山》等有影响的刊物上陆续发表了几个中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,并于1989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《父亲和他的情人》。还必须指出的是,在1991年前,她就翻译出版了《禅风禅韵》《死亡的流行色》《樱花号方舟》《日本新感觉派作品选》等日本文学与佛学著作。还应该强调的是,她还是一位称职的、别具慧眼的编辑。且摘抄王干一文的片断与诸君分享吧:

1986年10月,参加“新时期文学十年研讨会”期间,我在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与黑孩有一个短暂的见面。她担任过我的小说《退稿:第99次》的责编。1982年,我写过三篇自以为最先锋的短篇小说,三年间,到处投稿遭退,屡投屡退,屡退屡投。1985年受到结构现实主义的启发,我把我写的三篇小说嵌在小说中,写这三篇小说退稿的经历。没想到黑孩在自由来稿中发现了它,并送审发表了。我利用开会的机会去编辑部感谢这位耿仁秋(黑孩的本名)老师,一看到“耿仁秋”如此老成的名字居然是一位小姑娘,很意外,也有点失落。(见王干《内搏与卷内》,刊2020年第一期《湘江文艺》)

王干见到黑孩那年,黑孩才23岁。汪先生为黑孩散文集《夕阳正在西逝》写过序。汪先生的序很特别,这在他为别人所写的序中可谓是无伦有,意趣悠然。此序题作《正索解人不得》,说明了他对黑孩散文集的“求解”与“未解”。7000字左右的序文中竟然用了11处“?”,这些“?”或许也是值得我们体味再三、索解一番的。比如:在评及《醉寨》时,汪先生云,“ 这是不是寓言? 这有什么象征意义?“是,也不是。有,也没有。“这到底写的是什么?“这写的是母爱。”又如:“《一日忧伤》是‘恋父情结’? 我看最好不要这样说。”又如:“说黑孩的作品里有一种‘无可奈何’之感,有这样严重么? 我看的黑孩的作品不多,

大地上的丰碑——读周荣池长篇散文《父恩》

□ 颜兴林

在周荣池的过往散文乃至朋友圈中,不难看到其父周仁常的身影,也不难看出一位农民父亲的倔强、洒脱、刚毅、爽直的性格。一次在周荣池龙虬家中小聚,其父饭点骑着三轮带着小狗丢丢而来,吃饭时不用人喊自坐一角,喝酒不用人劝自斟一杯,你敬他酒他就喝,你与他说话他就答。我喝酒忸怩他立刻面露不悦,嘴唇上下翻动,但听不清他说什么。其余时间他只静静地吃喝,面色如山岿然不动,一吃完饭又立刻赶回南角墩。他全身都写满了故事,可他缄默无言,旁人难以探知。周荣池的这本《父恩》,解开了其父身上的谜团,也解开了乡村父子之情的密码,更给我这个同样出身乡村、自幼沉浸父恩,又苦寻写作之道的晚辈带来巨大的感动。

在《父恩》中,我看到了一个个真实丰满的艺术形象。文学创作不可能不带有作者个人的情感色彩,更何况是儿子对父亲呢? 但周荣池在书中极力去除情感的滤镜,直言“不想为自己的父亲粉饰,更不会言过其实地把更多的苦难附加给他”,他不仅写出了父亲的孝义、温情、乐观和仗义,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父亲的暴躁、粗鲁、顽固乃至促狭。其他如村书记、二叔、老正松、黎先生、高先生等人物形象,也全用白描,性格分明。至于乡风民俗,书中也直言既朴素坚韧,也碎嘴顽固、嫌贫妒富。这些真实的人物在书中屹立着,就像一棵棵大树在荒凉的村庄坚守着,在他们身上我能看到许多当年熟悉人物的影子,我也无法用简单的词汇去形容他们。人性种种多是生活百态催生出来的,苛求他们倒不如凝望他们脚下的土地。

在《父恩》中,我感受到无比真诚动人的情感。父子之情远没有母子之情那般温暖,尤其在生活重压之下,如干涸的河底般布满裂缝,彼此

暂时还不能同意这样的论断。”再如:“黑孩到我家来这两次,每次谈了大概有两个钟头。我们的谈话不‘成功’,有些格格不入。“这是什么原因?“是我们年龄悬殊太大了? 我的心已经像弗吉尼亚·沃尔芙所说的那样,充满纤维了?“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不同? 我是个乐观主义者,相信中国是会好起来的,人类是有希望的,而黑孩是‘小小年纪却生出那么多悲观’,而且爱流泪?“是我们的思维方式距离很大,甚至习惯用的句式词汇都不同?“看来也都不是。只因为我们还不熟,相互之间缺乏理解。”

这一段引文虽较长,但汪老在此真诚而率直地告诉黑孩、也告诉我们——“索解不得”,“只因为我们还不熟,相互之间缺乏理解”。从汪老的序中,我们不难看出:在着手写序之际,汪老至少还浏览了一些相关黑孩的评论文章,序中他对某些说法打问号即是明证。汪先生为写黑孩这个序是下了功夫的。序写就于1991年1月11日。1990年12月21日下午,卫建民就散文采访了汪先生,他告诉卫建民“我最近要给黑孩的作品写序”;可见,至少在二十天之前,他就已经开始琢磨对黑孩散文的“索解”了。

序的结尾似乎与评论散文无甚关系,却意蕴深长:“萧红有一次问鲁迅: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? 鲁迅沉思了一下,说:是母性的。鲁迅的话很叫我感动。我们现在没有鲁迅。再过两三个月,黑孩就要到日本去。接触一下另一种文化,换一个生活环境,是有益的。黑孩,一路平安!”对此,我很赞同李木生的观点,李先生说,“从他喜欢、理解、体贴、尊重、学习青年的言行里,我感到已经久违的鲁迅式的母爱。”(李木生《世纪绝唱——汪曾祺》)

之间只剩下钢筋般单一但坚实无比的责任。在书的《自序》中,周荣池坦言“父子之情多是暴躁、粗糙甚至是对抗的,又是真实而深切的”,对于父亲,他“不能说自己无比爱他,更多的是儿子的责任”。换到其父的角度,或许也大抵相同。对于儿子,他更多地视作未来出人头地的希望,再苦再累也必须养育的“儿老子”。天下的父子,多有一个对抗到和解的过程,而父子之情也有一个升华的过程,在书中我就看到了这个过程。当老父在儿子面前变得平和、在亲戚面前炫耀“咱们竟然也能在城里买了房子”时,当儿子平静地劝父亲不要再冲动、带他进城又由他返乡时,人世间最动人的父子之情莫过于此。它或许没有千言万语,也没有大悲大喜,却能击中人心中最柔软处。

在《父恩》中,我还体悟到散文创作的真谛。散文创作,追求形散而神不散,这是众所周知的。可一不小心,就会陷入形散如流水账、神散如病中吟的误区,前者絮絮叨叨,让人不厌其烦,后者自我感动,让人如坠云中。好的散文,故事好比骨架,支撑全篇;情感恰如血肉,丰满动人。优秀的散文,不会千言即止,也不会滔滔不尽,好似空谷中的一条幽涧,潺潺有声,情意绵绵。绝妙的散文,绝不会口号连篇,慷慨激昂,而是如水墨画一般,三笔两点,轻描淡写,言不尽而意满篇,以大量的留白供人遐思。以上当然只是我的个人理解,但在读周荣池多年来的散文时,我分明感觉他的散文从好散文到优秀散文再到绝妙散文,再到《父恩》的臻于化境、名列大家。读《父恩》时,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流畅、前所未有的享受、前所未有的共鸣和前所未有的感动。如果一篇散文写的是作者自己的故事,却让读者读出自己的过往,百感交集而无语潸然,那这篇散文堪称功德。

天下之大,何处无父子? 可父恩如山常不言,孝情满怀难言表,纵是父子相对,亦平静如水。感谢《父恩》塑造出大地上父亲的丰碑,供人瞻仰,供人倾诉,供人怀念。覆载之间,何处无村庄? 那里曾经无比喧闹,无数情绪肆意奔走,而如今人烟稀少,衰落得如同老者余齿。但只要还有父亲在,村庄的一切依旧会永恒成立。

上野樱花别样情——汪曾祺与黑孩述略

□ 金实秋

黑孩一直铭记着汪先生对她的关爱。在她的文章中、在她接受记者的采访中,以至在她的小说中,多次说到汪老,平淡的语气里蕴藉着深深的怀念与感恩。黑孩说:“我跟汪曾祺以及他的夫人相处很好,经常去他家里玩,还会带一些朋友跟他要字画。为我的散文集写的序《正索解人不得》,就是我亲自上门拜求的。”(黑孩《所有的过去,所有过去的》)

“来日本前的那年2月,汪曾祺老师为我送行时寄来两首诗,其中两句是:纸窗木壁平安否,寄我桥边上野花。”(黑孩《樱花雪》)

“其实,樱花我早在儿时便已经知道了,但上野的樱花,我却是从汪老师的诗中得知的。上野与樱花,自汪老师诗开始,便以一种相连的印象留在我心中。

“我经常领一些称汪曾祺为汪老的朋友到汪曾祺家里去。我的朋友都是一批年轻人,有写小说的,有画画的。”(黑孩《惠比寿花园广场》)

作家黄燎原在一篇文章中曾提起黑孩在汪先生家的一个“短视频”:黑孩平时是一个“善侃者”,那天我陪她去汪曾祺家,取汪老替她一本散文集写的序。她毕恭毕敬,双腿合拢,一个多小时总共没说几句话。汪老笑了:“你是不是一个很腼腆的姑娘?”(见《老不糊涂汪曾祺》)2022年,黑孩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《故乡在路上》,书中刊发了她与汪曾祺先生的合影,还有汪先生《送黑孩东渡》一诗的墨迹。

汪老前后给黑孩画过两幅画,写过两幅字,这在女作家中是少见的,或许还是唯一的。黑孩文中所说的“纸窗木壁平安否”,是汪老为黑孩画的《紫藤》所题七绝中的一句,全诗为:

开到紫藤春去远,黑孩犹自在天涯。
纸窗木壁平安否,寄我桥边上野花。
诗后署云:黑孩留念 曾祺

恒兴昌

□ 陈仁存

恒兴昌从前是东大街上的一家大百货店,伙计佣人二三十个。如今从外表看,门楼子已经落寞成很不起眼的、横梁一根的市井门楣,偌大的店铺划归搬运公司三中队放板车。想当年,四层砖的白石板托底的雕花门楼何等气派。昔日繁华,最终被搬运工人的大锤砸毁。可是从门楼子进去却让人感觉卧虎藏龙一般,错落有致,三间一小进的小院落,倚坡台上去,仿佛一幢幢依山别墅。粗大的梁柱、雕花的格子门窗,漆得红彤彤的。每个小院子都是花花草草、藤萝环绕,古色古香。这里的归属是财贸系统,分割给退休的老局长、老股长们养老。这些老同志的素质还是相当高的,没有在里面乱搭乱建,基本上保持民国建筑的风貌,清雅别致,假山石还在。恒兴昌家小姐住在门楼子右边的一处方方正正的小院,里面干干净净,也没有种什么花呀草的。

当年建这座大宅院花了整整一年时间,有从江南请来的工匠师傅。老板奶奶对工匠师傅们不薄,顿饭顿席,酒肉管够。到了腊月二十竣工回家的时候,个人身上都多长了一圈肉。老板家天天听到喜话一大箩。恒兴昌的生意越做越大,火遍江南江北。“恒兴昌”三儿三女。老板、老板奶奶都是开明人士,他们支持在外面读书的五子女参加革命。

她是“恒兴昌”最小的女儿,没有被大学录取,是因为“恒兴昌”地主兼资本家。她父母亲不在了,她没有工作,她没有结婚。她身形孤单,成为市井里一边缘人物。她天天坐在三中队门口纳鞋底,扎底线抽得飞快,差不多两天一双,要么就给人家打毛线衣,有时候走路也

此幅紫藤茂密绚丽,充盈着勃勃生机,蕴涵着汪老对黑孩的寄托和祝福。画未注时日,当在黑孩赴日之前所赠也。

汪老还给黑孩画过一幅《荷花》,几朵荷花有的含苞欲放、有的正当盛开,一股清雅高洁之气扑面而来。上款是四言祝福语——黑孩多福。落款曰:一九九六年六月 汪曾祺

1991年,汪老又书一立轴、一横幅以慰黑孩。立轴为诗,仍是七绝:燕市长歌酒未消,拂衣已渡海东潮。何时亦有思归意,春雨楼头八尺箫。诗后书:送黑孩东渡 一九九一年冬 汪曾祺其横幅以隶体大书四个字——一路平安落款为:送黑孩远行 汪曾祺 辛未辛未者,公元一九九一年耳。

黑孩没有辜负汪老的期望,正如汪老所期望的那样:“视野更开阔,写的作品也更好。”到日本后,她陆续创作了多部文学作品,虽然曾因生计一度中断,但再度燃起创作火焰时,则如樱花般绚丽烂漫。她陆续创作了小说《秋下一心愁》《惜别》《两岸三地》《樱花情人》《惠比寿花园广场》《贝尔蒙特公园》《一江春水》《太阳太远》《万有引力》及散文集《雨季》等。她还上了日本《每月新闻》人物专栏,据说她是上这个栏目的第一个外国人。赴日后黑孩的作品不少是在中国大陆刊发的,熟悉黑孩的崔道怡先生说,黑孩“把新著长篇小说拿回国内出版,可以说是,二十年后她捧来上野桥边的‘樱花’,敬献于汪老灵前”。(崔道怡《上野樱花别样情》)我以为,崔先生的话是对的。

2024年9月,黑孩在《世界博览》第17期刊发了题为《星离去》的怀念汪老的文章。文章透露了她把书名定为《夕阳又在西逝》的缘由。在她赴日前夕,汪老为她的书挑选了一张照片作为封面,“照片是在北京王府井拍的,我穿了一件长到脚脖子的紫色风衣,沐浴在夕阳下,皱着眉头,神情忧郁。……因为这张照片,我把书名定为《夕阳又在西逝》”。文章还写到了她从日本归国探亲时去看望汪老夫妇的一个细节。那时,汪老刚搬进新宅不久,汪师母在病床上拉着黑孩的手,一个劲地说:“黑孩你没有变化,你要常回国,常到家里来玩,曾祺常念叨你。”这个家,是汪老的家,也是黑孩的家。得知汪老不幸病逝的信息,黑孩在文章末尾写了这么一句话:

我觉得好像是一颗星从天际滑落下来。星离去了。

戳针子。她靠纳鞋底、打毛线衣挣钱养活自己。她一年到头在这里按时“上下班”。街坊邻居都叫她“恒兴昌家小姐”,小孩子叫她“恒姑奶奶”。这条街上知道她姓名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她也与人搭话,但是手上的活却没有停下来过。她端正的大脸庞,高高的个子,一把黑发扎成一条大长辫子拖到衣服的下边。她一年到头颈项上都扎条丝巾,乳白、鹅黄、蛋清或者宝蓝的。她从前看、从后看都是轮廓线条分明,谁都不敢用轻佻的眼神扫描她。她会吹箫,吹《梅花三弄》。只是夜晚在家里吹,吹得人心坎里动容。只有一个人在明月当空之际,从洞箫声里能真正听懂寒山绿萼、姍姍绿影、三叠落梅绵绵倾诉的余音。幽静典雅的“正宫调”,在空气中悠悠荡漾,在心中湿润地徘徊,触动愁肠,“初梅残雪两消魂”。这个人就是她的表哥张夫子,夫子是她的外号,古书读得特别多,且爱钻牛角梢。他住在炼阳巷,已有妻室,两儿一女。他的“工作”是在北城门口邮电所代写书信,收入微薄,供一家子勉强糊口。即使当天多赚了一两块钱,他也舍不得给自己买一瓶酒、两角钱猪头肉,而是在卖晚市的肉铺买一斤肉,回家让老婆加两棵大青菜烧一锅,一家子热乎乎地吃起来。每天晚上路过老恒兴昌,只要听见表妹吹箫,他就会停下脚步,等一曲吹完才慢慢地移动身体。

他生怕表妹察觉他在外头“偷”听,后来只听一半,甚至听一会儿就走了。他以为她是不食人间烟火的。女人是水做的,他作为男人,感觉自己已经很浊,总是一副很自卑的样子。他是张家米厂的大少爷,也曾有过那么一小段贾宝玉的日子。她像一颗孤星,高处不胜寒,而他自己更像是摇摇欲坠的残星,心念所及,借着夜阑凉风填补心中的空虚,在冰冷的世界里冰冷地活着。她落花生灯,端坐如云,无牵无挂。